

究竟是谁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 共和国元帅命令状 001 号是颁发给谁的？

董保存



建军节到了,有个单位叫我去给青年朋友讲一讲建军的历史。从哪里说起呢,于是我就模仿近年来高考的历史题目,出了个问答题:究竟是谁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共和国元帅命令状 001 号是颁发给谁的?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的时候,我到贺龙元帅家去,他的女儿贺晓明指着一个镜框让我看——这是 1955 年我军授衔的时候,毛泽东授给每一位元帅的“命令状”。

她说:你看看,我们老爸这个证书是 001 号。

当时我们很是诧异。

大家都知道十大元帅之首是朱德总司令,朱总司令是红军之父,自然排在第一位。但为什么授衔的证书上第一个排的是贺龙呢?这是不是写错了?

跟我同去的一位同志说,不可能!这么庄严的一个事情怎么能写错呢?毛主席绝对不会随手拿来把 001 号签给贺龙。

我们判断:这不是笔误,更不是随意填上去的。

那为什么把贺龙放在第一位呢?

这就给我们后人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为此,我访问了不少专家,有的同志认为,“八一”南昌起义的时候,贺龙是“八一”南昌起义的总指挥,可能是从这个角度,才有了这个 001 号的命令状。

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要把人民军队的建军节改为秋收起义的时间,即 9 月 9 日。毛主席明确表示:那不对,一个在先,一个在后。“八一”南昌起义在先,9 月 9 日的秋收起义在后,所以我们的建军节还是“八一”。

这个说法虽然有道理,但是,毛主席已经不在乎了,贺龙也不在乎了,我们也无从考证到底为什么把第一张元帅的证书签发给了贺龙。

说来有的同志可能不相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的总指挥贺龙,那时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他那时候没有入党。

1927 年 7 月初,周恩来找到贺龙在武汉的公馆登门拜访,这是两个人第一次见面。他们进行了深入的交谈,谈共产党面临的严酷形势,谈国家的前途命运,同时也谈到他们本人的前途。

在这次交谈中。贺龙对周恩来说:“我认定共产党是最好的党,只要你们相信我,我就别无所求了。”他要求什么?只要你们共产党信任我,我别无所求。周恩来当时跟他说:“你真心诚意的拥护共产党、支持工农运动,我们当然相信你,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你贺龙同志呢。”贺龙说,我听共产党的话,和蒋介石、汪精卫拼到底!

贺龙在后来的回忆中这样写道:“周恩来同志在武汉和我谈话,他说人有阶级,所以要有阶级觉悟,要懂无产阶级性……周恩来的话促进我的觉醒了重要作用。”可以说,和周恩来这次会见,是贺龙人生当中重要的转折点,也奠定了他们几十年患难与共的友谊。

1927 年的 7 月 12 日,中共中央决定,集结在九江、南昌地区的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 20 军,还有叶挺的 11 军 24 师,朱德原领导的第三军官教导团为主要力量,举行南昌起义。

也就是说,这三支部队组成了南昌起义的基本队伍,总共两万人不到。这里要给大家一个概念,当时的南昌城有多大?总共 17 万人口。当时能够集结起来的队伍,主要是贺龙同志的 20 军,这个 20 军包括他从家乡带出来的三千湘西子弟兵,参加了南昌起义。所以我们说无论湘籍的将领也好,战士也好,都为南昌起义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也是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7 月 17 日,贺龙把营以上军官召集起来开会,他愤怒地宣布了一个消息:“7 月 15 日,汪精卫公开叛变了革命,武汉国民政府正式同共产党分裂了。他们实行‘宁汉合流’、‘反共灭共’的政策,‘宁可错杀一千,不许漏网一个’……”“我们的队伍,是工农大众的队伍,是工

农革命的队伍,我们已经闹了几年的革命,现在,我们还要不要革命?”军官们回答“要革命!”“要革命!”贺龙接着说:“摆在我们面前有三条路,一条是我们自己把队伍解散,大家都回老家去,这条路行不行?”“不行!”贺龙又说:“第二条路,就是跟蒋介石、汪精卫去当反革命,屠杀共产党,屠杀自己的工农兄弟。这条路行不行?”“不行!”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贺龙接着说:“我看大家的意见是对的。这两条路我们绝不能走。第一条路是死路,是自杀的路;第二条路是当反革命的路,也是自杀的路。就是刀架在脖子上,我也绝不会走这样的路。”接着,他提出了第三条路。他说:“我们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要为工农劳苦大众的解放,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我们要走革命到底的路,坚决跟着共产党走,走到底!”20 军的连以上的干部一致拥护。

19 日,贺龙先是派船把朱德从武汉送到了九江,20 日他就率领部队从黄石坐船东进,23 日就到了九江。到了九江后,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谭平山就去 20 军的军部拜访贺龙,把中央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的事第一次和他全面讲了。讲完之后就跟贺龙说:“希望你率领 20 军和我们一块行动。”贺龙当时说:“赞成!我完全听从共产党的指示。”

随后,包括朱培德和当时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军长黄琪翔,第九军的军长金汉鼎都来找贺龙,他们希望贺龙跟他们回去,还跟汪精卫一块干,贺龙把他们顶回去了。汪精卫明确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就授意张发奎(贺龙的上司)给贺龙和叶挺两个人发电报,把他们骗到庐山开会,然后扣押起来,解除他们的兵权,杀掉他们。这个消息恰恰又被另外一位共和国的元帅叶剑英给截获了。叶剑英趁着天还不亮的时候,偷偷从庐山上跑下来直接找到了叶挺,告诉了叶挺,叶挺又马上告诉了贺龙。随后,贺龙和叶剑英、高语罕、廖乾武等人就在九江甘棠湖的小船上开了一两个小时的会,贺龙当时的

表态,令我们后人看来非常了不起,他说:“我决不上庐山,我的队伍也绝对不听从他们的调动往德安的方向去,我现在马上开到南昌去。”大家赞同贺龙的意见,立即行动,叶挺的部队在前面走,贺龙亲自率 20 军的全部兵力开往南昌。7 月 26 日,部队集结完毕。贺龙把军部就设在了西大街中华圣公会,和朱培德当时的五方面军的总指挥部留守处隔街相望。那里面有朱培德的警卫团,贺龙当时就命令他 20 军的部队提高警惕,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情况。就在军部里面,贺龙和李立三、朱德、谭平山、刘伯承、吴玉章等研究如何起义。就在这个军部,当时有人提出是不是可以争取张发奎也参加起义的时候,贺龙就站出来告诉他们说:“不行,我告诉你们这么几个字,想拉张则不必搞这种活动。若要起义,就不能拉张发奎。因为他和汪精卫的关系多么深我是很清楚,我们是武装暴动,张发奎绝对不会跟我们干。”现在实践证明,贺龙的判断是非常正确的。

7 月 28 日,南昌起义的总前委书记周恩来再次到了贺龙的军部,和他研究南昌起义的计划,征求他的意见。贺龙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这不是我们搞文学创作的人编出来的,现在中央档案馆有一个周恩来修改的“八一南昌起义”的说明稿。上面的话,是周恩来的亲笔。周恩来就代表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任命贺龙为起义军的总指挥,约定总指挥部就设在贺龙的 20 军的军部。刘伯承是参谋团的参谋长,协助贺龙具体的制定这次作战计划,指挥“八一南昌起义”行动。

7 月 31 日深夜。贺龙在军部把 20 军团以上的军官召集来开会,宣布 8 月 1 日凌晨 4 点起义。他说:“这次我们这个部队听共产党的领导,绝对服从共产党的命令。”布置完任务,部队就开始了准备工作。恰在这时,突然出了问题,有一个副营长叛变了,他把 4 点起义的命令泄露了出去。贺龙得到消息,马上给周恩来打了一个电话,说必须当机立断,提前两个小时,凌晨 2 点打响。

这就是南昌起义为什么提前了两个多小时的原因。

因此人们说,现在珍藏南昌起义纪念馆的贺龙用过的手枪,就是打响南昌起义第一枪的那支枪。

贺龙亲自指挥部队把朱培德的警卫团全部解决,到早晨 6 点战斗基本结束,消灭了敌军 3000 多人,缴获了 5000 多支枪,南昌起义的第一阶段胜利了。

南昌起义后,部队撤出南昌城,在前往潮汕的路上,遇到巨大挫折。在江西瑞金,也可以说是在腥风血雨的日子,贺龙被批准入党了。据当时的老同志回忆,贺龙的入党仪式,是在瑞金铺江中学的一个教室里举行的,由周恩来主持。现在南昌起义的纪念馆里,有一张贺龙入党登记表,记载了当时党组织找贺龙谈话的内容。谭平山问:“贺龙同志,此刻我们代表党向你问话,你必须如实回答不得隐瞒,请问你的动产不动产,现金还有多少?还剩多少?这是问的第一个问题。”贺龙说:“我现在什么都没有。”周逸群又问:“那你的社会关系呢?你在工农军政各界有什么社会关系?他们对革命的态度怎么样?”贺龙说:“以前的社会关系,参加革命后都不来往了。”……在我看来,这是金子般的一段话。贺龙可以说是把一切交给了中国共产党。他原本是国民革命军的军长,在武汉时,蒋介石为了拉拢他,给他 500 万大洋加一个汉阳兵工厂,还请他做武汉的卫戍司令。他不要官不要钱,宁肯不穿皮鞋穿草鞋,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是多么难能可贵。

董保存, 出版小说、报告文学 26 部, 500 多万字。作品多次在国内外获奖。纪实文学《毛泽东与蒙哥马利》获首届“鲁迅文学奖”,《投枪怀仁堂》获解放军文艺奖等。曾被评为全国优秀中青年编辑,十大传记作家,2014 年韬奋出版奖获得者。

为什么说大胡庄战斗二连的实际牺牲者是 83 人

秦九凤

我可能是淮安唯一两次去过河南安阳市、见过大胡庄战斗幸存者刘本成和他妻子杨秀萍的人,第一次是 1982 年,第二次是 2011 年。至今我还收藏着刘本成同志写给我的一封信。我们采访刘本成同志虽然过去了 36 年,但刘本成同志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恍若昨天。

1982 年,在淮安县委文教局创作组打临工的我竟然又被中共淮阴地委宣传部要去党教科帮忙编写《淮海文明花》一书。期间,奉刚刚组建的中共淮安县委党史办公室负责人尹金鹤同志之命,和淮安电影院的李寿新一起调查大胡庄战斗的始末。我们在淮城、溱陵一带走访了一些老人,还开了座谈会;又前往北京、郑州等地作了调查。特别令人高兴的是,在河南省安阳市找到了一位大胡庄战斗的唯一幸存者——刚刚从国防部所属安阳锻压设备厂“副”厂长任上离休的刘本成同志,因而得知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战斗事迹。

据刘本成老人回忆,他所在的新四军三师八旅二十四团一营二连原来共有 99 人,1941 年春,接受旅部命令,担任主力部队的前哨警戒任务后,把其中的 15 名老弱病残者留在了后方苏家嘴;当时,该连指导员去盐城抗大九分校学习了,所以全连剩下 83 人。团首长为了加强该连的领导力量,特命一营副营长巩殿坤随二连行动,以弥补指导员不在的责任。这样,二连出发时共有 84 人。在大胡庄战斗打响的头一天晚上,连长晋志云为了便于展开地方活动,特意在宿营地吸收了一名胡姓地主家的长工,和刘本成编在一个班,连军装也发给了这位新战士,也就是现在被人们称为“大勇士”的人。这样,该连在参战前共有 85 人。

大胡庄战斗打响前,副营长巩殿坤命令连部文书高建国到各班查看情况。高建国刚出门不久,就迎面遇上了已经杀掉我方岗哨而悄悄包围上来的鬼子和

伪军。高建国当时身上没有带枪,无法报警,他只好机智地转身就跑,以引诱敌人打枪,于是惊动了全连人马。高建国灵活地从一条旱水沟跑出,身上未负伤。这是因为敌人想打我方一个出其不意,没有在第一时间开枪。他一直跑到团部报了警。据接受我们调查的部队同志说,高建国当时身上没有带枪,他不是临阵逃跑,也不算参战人员,故参战人员是 84 人。

战斗结束的当天晚上,我二十四团政治处主任李少元(一说“李少院”)等人带领 20 多名化装成农民的战士及部分地方群众在打扫战场时,发现阵地上共留有 82 具英烈的遗体 and 两位侥幸活着的人。一排二班年仅 17 岁的小战士刘本成因被敌人的毒瓦斯熏倒,又因头部、胸部严重灼伤而昏迷不醒,被送到后方医院抢救脱险(据刘本成本人说,他醒过来后自己还能走)。他是这场战斗的唯一幸存者。另一位负了重伤被压在两屋巷口战友尸体下的战士,在李少元等人发现他时,他还能断断续续地说话,没说两句就昏迷过去了。李少元当即让当地群众把他送往三师后方医院,并派一名打扫战场的战士陪护。然而不幸的是,这位负重伤的战士在途中就已牺牲。因此,准确地说,大胡庄战斗的实际牺牲者是 83 人。

鉴于上述几个人员的变动,当年任新四军三师政治部宣传干事的朱鸿同志曾于 1982 年在北京西交民巷他的家中对笔者说,因为战斗前二连增加了一人(胡姓长工),组织上还没来得及掌握,而另一位牺牲者的遗体又未留在战场上,就被误认为牺牲了 82 人。所以,连请原新四军三师八旅政治部主任、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炮兵司令员的吴昆泉将军为大胡庄战斗纪念碑题写碑名时,也题为“八十二烈士”。

大胡庄战斗已经过去 77 年了,英烈们的血已经流过了 77 年,我们不能忘记那些为民族、为祖国献出宝贵生命的人。所以特撰此文,以正视听。

横沟“第一枪”声响永远录在历史档案

——纪念横沟暴动 90 周年

邵景元 李颖

横世英才横世雄,沟通民意乐从戎。
暴虐虐政道摇摇,动力勋猷显巨功。
大道已呈前进景,快车争逐北群空。
人人称快劣绅倒,心向往征背负弓。

这是一首当年清末秀才董鹏飞所作的七律藏头诗。诗题为“横沟暴动,大快人心”。

时光荏苒,物换星移。悠悠 90 个年头虽已流逝,但那打响苏北土地革命战争第一枪的声音仍回荡在淮安人民的耳畔,那发生在淮安北乡横沟暴动的画面将永久定格在江苏革命史册。

动因

隆冬时节,苏北平原上星罗棋布的麦田依然青绿。在淮安区和涟水县交界的软工镇,横沟农民武装暴动指挥部旧址便坐落于此。为什么土地革命首先发生在淮安北乡?俗话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有史料可考:“租税极重,捐税繁苛。农民食不饱腹,衣不蔽身,睡则无被”,所以“抗租、抗捐、抗债普遍于北乡。”1927 年春,大桥一带七八千人持械游行示威十多里,高呼反对二角亩捐,向北洋军阀孙传芳叫板。这个消息在《申报》“各地快讯”栏有载。我们曾于上海徐家汇藏书楼查证过,驻沪的江苏省委当然就近取材,在《江苏省各县党的组织及工作概况报告》中就有这样的文字:“淮安今年春间东北乡大桥一带农民反对孙传芳征收二角亩捐……”它便成了“九月中,派同志(指陈治平)前往”的导引。

中共党员陈治平和谷大涛曾就读于黄埔军校。他们带着“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指示回到家乡。不久,直属省委的“淮安特支”,淮安县委相继成立。随之,省委特派员何孟雄来北乡指导工作。该年 6 月,孙传芳兵败,逃往山东,途经北乡,遣弃一批枪枝于民间,为党组织发动

群众增添砝码。至此,暴动应运而生。

经过

1928 年 2 月 10 至 13 日,一场轰轰烈烈的武装暴动在淮安北乡发生。第一天上午,一千多人集中到横沟,召开誓师大会。陈治平讲话,赵心权整编队伍,明确分工,谷大涛分发红袖标和传单,作好一切准备。翌日清晨,大雪初霁,横沟小学上空飘扬着带有斧头镰刀图案的鲜艳红旗,大门两侧挂出“淮安县苏维埃政府”、“淮安县农民自卫军大队部”牌子。三位领导人分别带领队伍,按既定目标出发,到各庄地主、富农家收枪枝,烧契约,分粮食。陈治平一路捉住董庄大地主董玉璠,一枪击毙了这个恶霸。另一支队伍速往陈圩地主陈步营。一天下来,缴获枪枝 100 多,烧毁各类契约无数,群众分得不剩粮食,真是改天换地,大快人心。

12 日拂晓,国民党淮安县倾其常备队(中有一队骑兵),还邀请 26 军一个营作预备队前来镇压。敌方由软工镇西、北、东三门出动,从三面向横沟包抄。暴动队也分三支队伍作“正面迎敌”。面对实力几倍于己的敌人,我军暴动队员毫无惧色,英勇顽强,奋力拼杀,数次打退敌进攻,一直苦撑到傍晚,退至茭陵废河南岸。眼看敌方亦无力恋战,陈治平、赵心权带余部渡河至涟东,留“未红”的人转入地下斗争。

战斗中 24 岁的县委军事部长谷大涛,28 岁的中队队长章学廉壮烈牺牲。还有章仰芝、孙孝忠、高怀堂三位。他们是土生土长在淮安的红军指战员,其事迹在《革命烈士传记资料》一书中有载。该书由中央档案馆编辑、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系“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期间组织代表所写”,其中《江苏淮安死难烈士事略》由陈治平所撰。鉴于时空的差讹,“事略”与史实有出入,本着史

料当“立好、立准”原则,我们写了“考证”予以纠误。该文刊于中国博物馆《党史研究资料》1990 年第一期。

13 日,县常备队再来横沟扫荡,烧毁陈治平家房屋,逮捕陈桂元等 19 人,先置其苏州感化,后移镇江监狱。从此,北乡呈现一片白色恐怖。

影响

横沟暴动的影响超越时空地存在着、辐射着、延续着。后来,北乡连绵不断的革命斗争总带它的影子。例如,1930 年“八一”总暴动,县委书记陈伯扬和红 15 军独立师特务营营长张伯英带领游击队杀掉贾庄、徐荡两个地主;1939 年夏,古驿乡民众武装打响淮安抗战第一枪;原名软工的郝渠区被盐阜区评为“横沟区”;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个历史时期的中共淮安县委驻地先后全在北乡。

其实,横沟暴动的影响一开始就是通过江苏省委的《省委通讯》向全省、全国传播。瞿秋白也在《布尔什维克》(中共中央刊物)上肯定横沟暴动。《江苏省委关于淮安北乡暴动的批评和决议》指出的九条教训,全面而深刻地提出关于农村游击战争及其战法战术的思想。横沟暴动为我军军事思想的创建,提供了某些“原生态”“半成品”的实践与理论资源。

邵景元, 淮安区委党史工委原主任,江苏省近现代史协会理事,淮安区委文史特邀委员。
李颖, 清江中学老师,文史爱好者。